

# 中国特色地区社会治理模式探索<sup>\*</sup>

——以 1945—1949 年陈云对东北地区的治理为例

王晓慧

**提 要:** 地区社会治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1945 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东北地区的各项社会治理,如剿匪、建立根据地、土地改革、基层政权改造、保护工业和接管城市等,实现了对东北地区的有效统治,取得了东北各界对中共的政治认同。中共对东北地区的社会治理推动了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实践,也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一种尝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 陈云 东北地区 社会治理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地区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张曼丽,2011)。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属性,还从整个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出发,揭示了国家产生的必然性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提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中央编译局,1972:166),即社会决定了国家历史观的形成。也就是说,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社会。后来,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中央编译局,2014:191)由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能立即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

<sup>\*</sup> 感谢匿名专家对文章的批评指正,本文若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文责自负。

国家的阶级本质通过它的社会管理职能体现出来。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使用“社会治理”或“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但是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执行社会职能是国家政治统治或者说是国家的阶级统治建立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中央编译局，2014：188）而且，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中央编译局，2009：195），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是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对立逐步消失，从而实现建立在国家消亡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在建立之初还是在建立之后，都必须致力于解决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反之，也只有通过解决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才能够进一步地促进和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因此，要解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就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和必要手段来更好地执行社会职能，即，如何进行治理就成为破解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核心，也就成为维持无产阶级专政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1945年4月，中共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而且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为了建立这样的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同时也需要有若干具体的纲领，包括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统一；人民的军队；土地问题；工业问题；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外交问题等十个方面。1945年8月11日，在获悉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毛泽东在《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454）中又提出了扩大解放区、放手发动武装群众、加强城市工作、扩大民兵组织、实行土地革命等多项任务。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中共拟实施的各项具体任务不仅属于《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实现手段，而且也是向着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迈进的一种中国式的方式。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后就如何建立新的国家及国家的性质进行的探讨，实质上开启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进行地区社会治理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

在 20 世纪中国广博辽阔的疆域版图中，东北地区是最为特殊的地区。1932 年 3 月至 1945 年 8 月，日本侵略者的强占不仅阻断了东北地区向近现代文明稳健迈进的发展进程，而且阻隔了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国家整体的一部分与其他地区一起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东北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东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就应该置于国家的统治和治理范围之内。目前针对地区社会治理研究主要从管理学、社会学、边疆学、民族学等学科出发，呈现以中央政府的治理政策和地方治理策略为主、多与边疆民族研究相结合，进行宏观层面的制度梳理、从社会组织和社区等角度切入研究等特点（郑永年，2013；李培林，2014；吴福环，2014；晏熊，2014；吴开松、杨芳，2014），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进行讨论的文章还不够多。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内关于地区社会治理的文章大多探讨了其社会治理的思想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启示（舒永久，2013；高健、秦龙，2015），借鉴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方法与视角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地区治理模式的文章也较少。本文选取 1945—1949 年的东北地区作为个案研究，是因为这一时期不仅地区社会治理主体复杂，而且地区社会治理对象也很多元，二者都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从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1945 年至 1949 年之间对东北地区的社会治理情况来看，中共的社会治理意识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已初现端倪，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初步实践。正是因为中共对东北地区的准确把握和全方位的社会治理，才为之后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本文拟通过分析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1945 年至 1949 年对东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实践，在概括归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对东北地区的社会治理特点的基础上，解析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初步实践，进而尝试推动具有中国特色地区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

## 二、1945—1949 年东北地区的地缘形势和经济特点

东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北地区对中原地区持续产生强大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原王朝的盛衰与兴亡。清代东北的重要地位胜于历代，它是清朝和满族的发祥地，清王朝第一次实现了对东北的完全统一和在管理体制上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变革（戴逸，2012）。晚清以来，沙俄、日本相

互争霸，东北地区成为两国图谋的战略要地，日本独占东北，妄图以此为跳板建立以它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1945年，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美苏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成为当时世界政治的新格局，美、苏的对华政策直接影响了东北地区的前途和命运：美国坚持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帮助蒋介石控制全中国，削弱共产党，以达到将中国变为附庸的目的；而苏联从战略利益和对抗美国的国际战略出发，目标在于确保苏维埃国家、特别是西部新边界的安全，同时全力维护和巩固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在东方只是满足于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的状况及在中国的若干权益（刘信君，2006：683-684）。东北地区变成了美苏之间激烈角逐的重要东方战场。

诚然，1945年之后的东北地区是中国社会感受外来压力最大的地区，从国内形势来看，东北地区亦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力求第一时间获得的地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指出，“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410-411）由此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蒋介石对东北的重要性也十分清楚，他曾讲道，“没有东北，就没有华北；没有华北，就没有中国。这个放弃东北意见，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刘信君，2006：690）他的战略方针是“控制华北，抢占东北”。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国共和平谈判的发展，以及美苏之间的战略调整，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1945年“独占东北”已经不可能，在1945年11月底，将战略方针调整为“让开大陆，占领两厢”，即“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1：373-374）而国民党方面，一面加紧调兵进入东北地区，任命伪军、土匪为总司令或总指挥，同时联合美国与苏联继续讨价还价，抓紧接收东北；一面进行政权建设，把东北三省改划为九省，设立东北行营，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继清之后，东北地区再次成为决定中央政府历史走向的关键地区。

1945年起在东北地区上演的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较量，不仅与东北地区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有关，而且还与东北地区较强的经济基础相关。1934年，日本关东军当局命“满洲国”发表了详细的产业声明，具体提出了完全统制的与半统制的以及属于统制范围以外的经济事业（孔经纬，1958：45-46）。根据这个声明，重要的工矿业几乎由日本企业独占经营，一般工业名义上可以自由经营，但也必须受到控

制，日本强行把东北地区打造成了全中国高度工业地带。至 1943 年，东北地区的煤产量占全国的 49.5%，发电能力占 78.2%，生铁产量占 87.7%，钢铁产量占 93.0%，水泥产量占 66.0%（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1988：253）。但是，东北地区工业所需重要设备和若干重要原材料都需要仰赖日本供给，而且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为了就地满足日本发动战争及其国内利益的需要（孔经纬，1958：74）。农业方面同样如此，其主要目标是提倡准战时经济，发展所谓日本“满洲国”经济集团，使它在战争有用的原料商成为自给的单位（琼斯，1959：172）。据统计，占全国 1/3 的东北地区对外贸易从中国对外贸易分离出去，成为殖民地性质的对外贸易（丁溪，2006：114）。这就决定了东北地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畸形发展的殖民性质经济，工业机械化程度和自给率很低，资源外流严重，工业的畸形发展带来区域产业发展失衡，同时造成乡村工业和民族工业停滞不前，农业发展严重倒退，社会危机和矛盾重重。这种经济发展主要靠外力牵引驱动，一旦外力中断或制止，对区域社会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

总之，1945 年至 1949 年的东北地区是各种冲突的策源地，汇聚了国内外各方政治势力的矛盾焦点，经济发展处于畸形结构，区域社会矛盾随时爆发。东北地区的这些社会特征不仅不利于自身区域社会的平稳协调，也不利于中国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统一进程的顺利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东北地区的治理实践，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奠定了基础。

### 三、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共东北治理实践

1945 年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彭真为书记，陈云等四人任委员，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陈云从 1945 年 9 月 15 日至 1949 年 5 月 9 日作为中共主要领导干部在东北地区进行活动的，他“曾任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局长兼南满分局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沈阳特别市第一任军管会主任等职。”（朱佳木，1999）他在东北解放战争和战争胜利后的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管理工作中，都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根据局势变化，提出并坚持放弃攻打大城市、建立巩固根据地的策略（中共哈尔滨市党史研究室，1998：30 - 32），这与中共中央的战略构想基本吻合。在这一战略总方针的指导下，他陆续领导

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如建立北满根据地、剿匪、领导土地革命、解决财经困难，并在东北解放后成功接管沈阳，领导恢复和发展经济等。对东北地区而言，陈云的这些实践与举措，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东北地区的社会治理，不仅有利于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而且还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的东北地区的治理战略。

第一，陈云制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与剿匪缓和了东北地区基层的混乱局面，客观上推动了东北地区传统社会结构的改变。

陈云从中共中央的决议和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多次提出剿匪和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45年11月29日，陈云在《对北满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军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510）陈云认为剿匪是建设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前提，也是“苏军未撤而蒋军未到时，北满决定胜利的一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516）因为，东北地区的土匪“不是历史上的‘胡子’，而是经国民党委任过的国、伪、匪合流的政治土匪。北满2/3的大小城市实际上是操纵在他们手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516）他对东北地区的土匪的特殊性具有清醒认识，所以他特别指出北满一些县委委任地主分子组织保安队是错误的，因为这等于“实际上增加了许多国民党的武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518）

近代东北地区土匪猖獗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在日俄战争期间，两国就积极拉拢并招收东北的无业游民及地痞流氓组成华队，为己所用。战争结束后，这些土匪“自奉天东西北三面，至吉江沿边一带与蒙古部落，山深密林之处，大半皆其窟穴。”<sup>①</sup>（邵雍，2012：21）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收买和利用土匪，为其侵华、改造东北服务。东北的土匪大多为“地头蛇”，有自己的匪窝、匪溜子（行动路线），有深山密林作后方，并藏有粮食，在匪窝及行动路线的村落中设有情

<sup>①</sup>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军事军政篇，第156页，文海出版社影印本（五）第2891页，转引自邵雍，2012，《中国近现代史辨疑与释读》，上海：学林出版社。

报人员（邵雍等，2012：364）。北满地区由于背靠苏联，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险要，更是成为有名的土匪活动地区。总体而言，东北地区的土匪的破坏性是主要的，正是因为他们强大的社会破坏力，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又被国民党收编成为政治土匪，沦为国民党的工具和炮灰，并与当地封建势力相勾结，对东北社会和人民造成严重侵害，与中共形成抗衡。

1946年6月25日，据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关于东北三年来的公安工作的报告》粗略统计，东北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土匪武装约20万人（刘信君，2006：750）。根据北满分局和陈云的部署，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军区等对土匪进行了武装清缴，从1945年9月至1947年4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共剿匪作战1300余次，共歼匪10万余人，东北匪患基本肃清（黑龙江档案馆，1982：136-139）。剿匪的成功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提供了保障，为东北地区恢复社会安定和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隐患。陈云是北满和南满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1945年12月1日，陈云在北满分局扩大会上强调“新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根据地”，“工作的中心要放到乡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512）。根据12月28日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陈云提出了“必须争取时间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可用的力量发动农民，经过土地斗争，达到武装农民的目的，创造根据地的真实基础。”（中共哈尔滨市党史研究室，1998：598）他认为，根据地的建立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345）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发动群众，密切与人民相结合。

第二，陈云制定领导的土地改革和基层政权改造推动了中共解放东北地区的胜利进程，同时也开创了中共的人才培养模式。

1946年4月20日，陈云向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就北满根据地建设提出建议：“一要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二要把发动群众看成一切工作的根本；三要使得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565）他将北满土匪猖獗的实际与土地改革、解放战争联系起来，提出了“经济——武装——再经济”的发动农民的办法，即“用分配开拓地、满拓地<sup>①</sup>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增加伙种雇工

<sup>①</sup> 开拓地和满拓地是东北地区特有的土地占有现象，开拓地是指分配给日本移民的土地，满拓地是指租给中国农民的土地。

的实物工资或减低其租额，领导零工向地主、大佃农租地的方法来满足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的雇农的要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565）陈云的建议得到了充分肯定，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要求东北局“运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各种形式及当地广大群众所创造的各种形式，使地主阶级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568-569）至此，东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开始。

东北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6月开始至1948年10月结束。陈云根据形势和中共中央指示，总结出适合东北地区农村特点的土改办法和经验，确保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1946年11月7日，他指出要重视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现象，为此东北局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及时纠正了由于不熟悉农村引起的土改工作不彻底的问题。他还在1947年6月发布的指示信中总结了开展土地改革应注意的十二项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562-563），成为东北新收复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重要指导文件。

随着土地改革运动、剿匪斗争的深入开展，东北地区基层政权改造也全面铺开。陈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指出“县委就是民委，民委就是农委。”“县委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赵德尊，1998：139），进一步明确了基层政权工作的重点和方向。他亲自指导了北满分局所在地宾县的农民工作，在宾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层政权改造的具体办法，如“用县政府减租布告及扣押孙克仁（汉奸分子——引者注）的行政手段来配合农民斗争”；“农民组织形式，采取农民联合会，只准农民参加，不准非农民的上层分子参加”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b：450）。

土地改革和政权改造需要大量中共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参与，而陈云自始至终一直密切关注干部的培养工作。他将东北地区农村的复杂情况与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土地改革等结合起来，使得党员干部在多个不同环境下得到了锻炼。陈云把培养干部工作提到了首要位置，“东北建党首先要靠几万关内来的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b：510）他认为群众工作的开展，如果“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干部，过度扩大运动范围，就容易出乱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b：525）。他十分关注干部的思想统一问题，经常同干部们谈话，做思想工作。针对南满的恶劣环境，他提出了敌后工作干部应具备的几个条件，即“精干、经验、坚定、团结、共甘苦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b：478）。他还“特别注意培养本地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b：478）。土改下乡干部的工作思想情况也是陈云的重



点关注对象，“南满分局所属三个省委共派出二千多名干部和北满来的四个土改工作团，分头下乡，发动群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b：517）

在熟悉了东北地区农村之后，这些干部又进入城市，积累了大量城市管理经验。后来，在介绍沈阳接收经验时，陈云专门对干部问题进行了思考，“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有一感触，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b：579）可以说，东北地区党员干部工作，在陈云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培养之路，为新中国储备了大量经验丰富的党政干部人才和经济社会管理人才。

第三，陈云制定的一系列工业保护政策和领导城市接管，强化了东北地区工业基地的地位，推动了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

为了侵华和对抗苏联的需要，1937年至1944年，日本侵略者连续制订“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三年计划”和“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将东北彻底变为其军事生产基地，进一步掠夺和独占东北工业。据统计，1930年至1944年，东北煤的产量由年产不到1000万公吨增加到2653万吨；发电量由441百万千瓦时<sup>①</sup>（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1988：252）增加到4481百万千瓦时。1941年生铁产量138.9万公吨，较1930年增加了3.5倍，钢锭产量由1936年的36.4万公吨增为1941年的57.6万公吨。后由于联合国的不断轰炸，1944年生铁和钢材产量逐渐减少，同时酸、碱、纺织工业等，由于原料不济或转向生产军用品等原因，均以1940年前后为最高点而开始缩减与下降。这种集中发展的结果就是把东北打造成了高度工业地带（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1988：252-253）。

陈云一直对东北地区工业的重要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要争取大工业，只有在满洲才有可能，此着关于中国前途甚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496）。1948年3月，在东北地区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后，东北局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城市工作，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陈云提出发展工业生产必须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加强工业的计划性；二是改善国营、国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主要是贯彻企业化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三是要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b：540-542）。他强调指出，“现在工业中最严重的问

<sup>①</sup> 此数据由“1941年的发电量为3520百万KWH，较1930年增加了6.98倍”推算得出。

题是计划性问题。我们现在下面各部门可能是有计划的，但是上面没有计划。如果只有部分的计划，而无统一的计划；如果下面有计划，而上面无计划，这样各个部门的计划都有可能要统统破产。没有总计划等于无计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a：633）他提出了各类工业的量化指标和产量比重，总结了东北地区国营工业的基本任务，即“保证供给，扩大民需、公需，达到‘帮助国营指导私人工业’的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b：554）总体来看，陈云制定的工业政策和措施对东北地区的工业具有保护、恢复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一方面，中共需要依靠东北地区工业的支持，以计划来安排生产在战事紧迫的条件下是一条高效率的途径。另一方面，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管理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通过民主管理办法维持工厂，有稳定人心和恢复生产的作用。

此外，通过计划手段来理顺东北地区工业，也便于将工业生产和接管城市、稳定秩序等“条块结合”，构建城市建设管理体制。陈云接管沈阳时提出的“自上而下，按照系统，统一接收，一切财产、物资、人员、文件均原封不动，先接收，后分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5：668）的接收原则，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在接收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外交问题、秩序整顿和经济发展等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的问题，如他提到，“必须抓的特务要经过军管会批准”，“要解决一百五十万人吃饭问题，赶快修好铁路运去粮食”，“要避免死市，保证市场物价无大波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b：564）为了恢复秩序，陈云着重抓了五个问题，即恢复电力供应；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收缴旧警察枪支，让他们徒手服务；利用报纸传播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资问题。陈云还迅速处理了散俘和疏散弹药等紧急问题，使得城市秩序得以规范。

#### 四、对有中国特色地区社会治理体系的初步探索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区域之一，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治理舞台上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特点：一方面，治理策略、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另一方面，中央集权的衰退与地方割据分裂造成不同地区的羸弱与强势并存。此外，地区治理主体多元，不仅包括国内多种政治势力，而且还包括外国侵略者。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角度对东北地区的社会治理进行梳理，既

是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揭示，也是建构当代有中国特色地区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前提之一。

总体来看，以陈云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东北地区的社会治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建立东北根据地，消灭土匪，改变社会阶层结构。匪患的肃清和根据地的建立，基本消除了晚清朝以来在中国局势整体动荡情况下传统东北社会结构中膨胀起来的、阻碍社会进步、不利于国家主权统一的“地方性特殊群体”，解决了影响近代东北地区由于匪患猖獗带来的安全治理问题，为社会的平稳发展和政权的顺利交接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在剿匪之后立即开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反对武装的地主、土匪、大排。以北满地区为例，占北满农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为雇农，北满雇农最迫切的要求是分配开拓地和满拓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b：451-452）。使得广大雇农和其他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开拓地和满拓地，“而不是一般的分地，”“由农会组织自卫队，将当地警察及地主保安队的武装转到农民手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a：481）广大农民成为地区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主导力量，一定程度上推动改变了传统东北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为之后东北地区社会的重建打下了基础。

第二，开展土地改革，进行基层政权改造，培养社会治理人才。农会组织是在土地改革过程的反清算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农会和贫民团结在一起，领导了具体的分土地、分粮分牲口等土改任务。组织农会的目的就是改造政权，通过土改运动，地主、富农等失去了曾经的统治地位，贫雇农成为农村最活跃最积极的阶层。在农会组织的基础上，中共十分注意吸收和重用土改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际斗争对他们进行锻炼。“因此，在土改运动中，有大批农民积极分子被选为乡村基层领导干部。”（王瑞芳，2010：186）实际上，之后开展的乡村人民代表会议就是在农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广泛建立的农会组织，成为中共基层政权的组织基础。正如廖鲁言（1952）在土改结束时总结的那样，“一般乡村均已树立了农民的真正优势，农民协会在那里有很高的威信，真正掌握了农村政权，解除了地主的武装，武装了自己，管制着那些不安分的不服从劳动改造的地主，农民真正成了农村的主人。”

第三，领导沈阳城市的接管，对东北工业进行系统整顿，形成城市社会治理。陈云制定的城市接管原则和实施的具体办法，为中共接收其他城市提供了经验指导。而且一直视经济生产为中心任务的陈云，在接收沈阳的同时就立即推动了沈阳城市的正常运转，初步形成了与工业经济区域类型紧密相连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行政

一元化是这种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作为特殊时期最高领导机构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城市的管理者，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它以全能的身份包揽一切社会事务，构成了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具有恢复性质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无疑在促进城市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稳定人心、巩固政权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考察上述内容可以发现，陈云提出的地区社会治理的思想和领导的具体实践，一直离不开“生产”和“人”这两个核心概念，其中，后者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土匪、农民和中共干部。陈云的地区治理方式是以东北地区的总体社会形势、地缘特征为基础，以无产阶级政权的确立为目标，将各种治理策略最大限度地下沉到基层并力争取得实效，贯穿连通中央决策与地方执行，使中央与地方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继而推动解决或者缓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延续性来看，这种治理尝试不仅在努力寻求对东北地区的有效统治，力求逐步推动东北各地对中共的政治认同，而且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过程中，从逐步探索社会职能入手，在客观上履行了对地区进行社会治理的责任和义务，将地区社会治理与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二者相统一的努力。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特色地区治理模式的一种探索。在这一点上，相比较而言，国民党方面虽然进行了政权建设，但恰恰正是由于未能从东北地区内部自下而上地解决政权建设与社会治理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反而将筹码放在与美国和苏联的博弈等外在因素之上，最终导致了在争夺东北过程中的失败。

东北地区命途多舛。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治理东北地区的进程中，根据东北地区的社会整体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推动了中共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些策略和应对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地区的区域定位、经济类型、社会结构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东北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东北地区如何根据自身优势和国家对其治理要求来实现跨越和调整，推动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是一项重大挑战。此文也期望能够从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东北地区社会治理的策略和经验中获得一些启发。

#### 参考文献：

戴逸，2012，《清代黑龙江将军与东北边疆治理》，《东北史地》第5期。

- 丁溪主编, 2006, 《中国对外贸易》,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1988,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高健、秦龙, 2015, 《论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特征》,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第3期。
- 黑龙江档案馆编, 1982, 《剿匪斗争》,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孔经纬, 1958, 《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李培林, 2014, 《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廖鲁言, 1952, 《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9月28日。
- 刘信君、霍燎原主编, 2006, 《中国东北史》(第6卷),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琼斯, 1959, 《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 胡继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邵雍等著, 2012, 《中国近代土匪史》,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邵雍, 2012, 《中国近现代史辨疑与释读》,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舒永久, 2013,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探索》第1期。
- 王瑞芳, 2010, 《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吴福环, 2014, 《论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5期。
- 吴开松、杨芳, 2014, 《社会组织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价值研究》, 《贵州民族研究》第9期。
- 晏熊主编, 2014, 《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研究》,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 赵德尊, 1998, 《赵德尊回忆录》,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张丽曼, 2001,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 《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 郑永年, 2013, 《21世纪的中国边疆治理与发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宾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8, 《中共中央北满分局》,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1981, 《刘少奇选集》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中央编译局, 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20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6, 《毛泽东文集》第3卷(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2005a, 《陈云文集》第1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2005b, 《陈云传》(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2015, 《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201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朱佳木, 1999, 《陈云与七届二中全会》, 《党史博采》第3期。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 吴莹

economic problems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Hengqu Village in Shanxi Province , intends to present a series of mechanisms of peasant cooperation in rural society. Through specific cooperative events like land adjustment , water irrigation and labor exchange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eading and coordinating role of the village cadres in the cooperation.

Waiting in Line or Getting in by the back door: The Dynamic Process of Beds' Allocation in the State-run Aged Care Institution under the "High-subsidy and Low-price" Policy

..... Zhang Xiang & Wang Jiali & Zhang Haitong & Li Yang 162

**Abstract:** This is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on the real allocation rule of beds in a state-run Aged Care Institution (ACI) under the "high-subsidy and low-price" policy. The price of state-run ACIs is regulated at a price lower than the full cost.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not only the construction subsidy but also the operational subsidy to state-run ACIs. But we find in a case study on Chunhui ACI that over 77.5% of aged people successfully moved in after 2007 by the back door. Most of the occupants are not low income or disabled elder persons that need subsidy most ,but are in good economic condition or at a high social status.

### ***SOCIAL STUDIES FOR MARXISM***

Study o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ext Analysis of the News of Constructing A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of People Daily' s Front Pag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 Yu Qin 18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xts of the news of constructing a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of People Daily' s front pag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rough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 firstly , this paper researches and analyzes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condly , it verifies the expanding process of the semantics of this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 the surface structure. Thirdly , it finds that the ethics of this discourse is a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a dualistic relationship of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to an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official discourse and the public one.

The Exploration of Regional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aking Chen Yun' 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ortheast China in 1945 - 1949 as An Example ..... Wang Xiaohui 195

**Abstract:** Regional social governance is an organic part of Marx' s theory of state. After the surrender

of Japanese invaders in 1945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represented by Chen Yun achieved an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northeast China and obtained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northeast China through a variety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northeast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northeast China help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n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liberation war in the northeast and establish new China , which is not only the practice of Marx’ s theory of state , but also an attempt to build a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REVIEW**

Study o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in Contemporary Artifacts and Institution: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Artifacts in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 *Lu Yaoxuan* 208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udies on artifacts in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Symbolization is a recognized characteristic of artifacts in the study of material culture in social sciences , and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artifacts’ symboliz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eaning of artifact with symbolic attribute comes from the outside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endowment of its meaning is a process of legitimization , which is the mechanism of acquiring the meanings , and helpful for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acknowledgment of the symbolization of artifacts.

## **BOOK REVIEW**

The Sociological Logic of Animal Spirit: A Discussion of *Animal Spirit*

..... *Zhang Shuqin & Song Qingyu* 228